

抗日战争时期的 中共江西省委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央文献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党史资料第三十五辑)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江西党史资料

第三十五辑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江西省政府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7.5 印张 20万字
1995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9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1—1200册

ISBN7—5073—0314—4/K·103 定价：8.00元

主 编：苏多寿
桂玉麟
刘开汶

副 主 编：蒋 伟

本辑编辑组成员：蒋 伟
汤静涛
晏蔚青
本辑责任编辑：晏蔚青

目 录

综 述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系统概述 蒋伟(1)

文献资料

江西省委政治报告	(8)
江西省委抗战两年来工作总结(节选)	(44)
江西省委组织部工作报告	(69)
江西省委统一战线工作报告	(88)
江西省委敌后工作与武装斗争报告	(100)
江西省委工运工作报告	(112)
江西省委妇女工作总结报告	(124)
湘鄂赣特委工作报告(节选)	(134)
赣南特委两年来的工作报告	(149)
赣南特委给中央统战部的报告	(166)
赣西南的统一战线工作	(170)

赣西南特委关于红帮的材料 (175)

回忆资料

- 中共东南分局与南昌青运 黄知真 (183)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南昌活动的片断回忆 雷洁琼 (185)
抗日战争初期在南昌 薛暮桥 (187)
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的成立经过 夏征农 (190)
南昌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回忆 余昕 郭敏 (196)
抗战时期赣州党组织的活动片断 眭新亚 (202)
党在赣州的抗日宣传活动 余致浚 (208)
抗战时期赣州市委及党在“工合”的活动 薛景扬 (211)

大事记

- 抗战时期江西党史大事年表 蒋伟 (215)

综述

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系统概述

蒋伟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江西省委所辖组织被分割在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内，面临日伪和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的两面夹击，陷于极端艰难的逆境之中。在抗日救亡的民族解放巨浪中，江西党组织曾大力开展了统战、民运、青运、妇运、工运、农运、军事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抗日活动，取得了光辉的业绩。但令人痛惜的是，1941年期间，中共江西省委系统的各级组织遭国民党中统特务的破坏，县委以上组织先后解体。历经多年苦斗之后，江西共产党人的鲜血既洒在抗日战场上，也浸透了国统区的大地。

中共江西省委系统的党组织自1942年至1949年上半年停止了活动，但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各项艰苦卓绝的工作，仍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江西省委组织部沿革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江西各游击区内的党组织先后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下，江西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工作。

1938年8月，中共江西省委在南昌秘密重建，省委机关设在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内。省委成员分工为：书记曾山、副书记涂正坤、组织部长曾金声、宣传部长黄道、民运部长邓振询、妇女部长李坚贞

(女)、青年部长钟效培、秘书长郭潜。

省委成立时，赣北和鄂东南已相继沦陷于日军之手，南昌形势十分紧张。省委曾一度迁往吉安。1939年3月，省委奉命改组，中央意见是由黄道任书记，后因黄道即将赴皖南，书记由郭潜担任，副书记涂正坤、组织部长曾金声、民运部长邓振询、妇女部长李坚贞(女)。

3月底，日军占领南昌，省委转往上饶。撤出南昌后，省委民运部长邓振询和妇女部长李坚贞转往皖南工作，副书记涂正坤和组织部长曾金声于同年6月在“平江惨案”中牺牲，只剩下书记郭潜带少数人滞留在上饶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内。7月底，省委调李辉任省委代理组织部长，调黄耀南任省委代理宣传部长。省委机关设在上饶。

8月，郭潜奉召前往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工作，由李辉、黄耀南、唐敬斋组成临时省委。11月，郭潜返回江西，在上饶召开会议，宣布南方局的决定，由郭潜、李辉、黄耀南3人组成常委、省委领导分工为：书记郭潜、组织部长李辉、宣传部长黄耀南、社会部长李辉(兼)、妇女部长李健、青年部长唐敬斋。会后，省委领导分头前往赣州和吉安工作。

国民党五届中全会后，全省公开反共事件迭起，形势不断恶化。江西省委于1940年初在赣州召开会议，决定建立武装根据地，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此后，省委开始在安福县南乡山建立秘密阵地，调颜富华任省委军事部长，主持省委阵地的建设工作。下半年，省委机关迁入安福县与莲花县交界处的狮子山。同年11月底，郭潜对省委领导成员作了调整，书记郭潜、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颜富华、宣传部长兼社会部长骆奇勋、青年部长唐敬斋、统战部长林鸣凤。

1941年2月，郭潜调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工作，指定颜富华、骆奇勋、唐敬斋3人共同负责省委工作，由颜富华代理省委书记。

6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谢育才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月中旬，谢育才在南乡山省委驻地召开省委和各特委负责人会议，听取工作汇报。会后，谢育才和骆奇勋下山，准备前往广东曲江，在吉安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9月初，由于叛徒出卖，国民党特务又破坏了中

共赣西南特委。随后，诱捕了省委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颜富华和青年部长唐敬斋。至同年12月底，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成员全部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省委被破坏。由此至解放战争胜利，江西都没有恢复省一级党的领导机关。

二、省委下属主要组织

由于环境的影响，中共江西省委下属组织及其管辖区域时有变动。省委成立之初，直属下级组织有湘鄂赣特委、湘赣特委、赣南特委、遂万泰县委、吉泰中心县委、南昌市委、赣江特区委。

1939年1月，省委将湘鄂赣特委领导区域中的一部分划出，建立了赣西北特委。5月，新组建了赣西南特委。

自1939年5月至省委遭破坏，省委直接管辖的下级单位是4个特委：湘鄂赣特委、赣西北特委、湘赣特委和赣西南特委。这4个特委的基本情况如下：

中共湘鄂赣特委

1937年11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按党中央的指示改为湘鄂赣特委，辖区初为29县，其中湖南5县，湖北10县，江西14县。下辖修水、万载、奉新、岳阳、咸宁等中心县委和平江、浏阳、武宁、铜鼓等县委，各中心县委又下辖若干个县委。特委初成立时，涂正坤任书记，罗梓铭任组织部长，骆奇勋任宣传部长，机关驻地在湖南平江嘉义镇。1939年6月12日，驻平江的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特务营围攻湘鄂赣特委和新四军驻平江通讯处驻地，杀害涂正坤等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特委遭破坏。同年8月，特委机关迁至平江县东坑。翌年特委撤销。

中共赣西北特委

1939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将湘鄂赣特委管辖的两个中心县委合并，组成赣西北特委，在宜春、万载、奉新、萍乡、分宜、宜丰、上高、新余、清江、高安、靖安、安义、瑞昌、德安、星子、永修、新建等县开展

工作。特委机关设在宜春县慈化镇，李辉任书记，吴继周任宣传部长，卢振陆任民运部长。1942年2月前后，卢振陆等被捕叛变，赣西北特委被国民党中央统特务破坏。

中共湘赣特委

1937年11月，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按中央指示改为湘赣特委，机关设在莲花县境内的棋盘山垄上村。翌年2月迁莲花县境内的界化垄。7月迁湖南攸县的山关村。1940年2月迁安福县南山。特委工作区域为江西的莲花、安福、永新、宁冈和湖南的攸县、茶陵、酃县、醴陵等县，先后下辖攸（县）醴（陵）萍（乡）、茶（陵）攸（县）莲（花）、吉安、攸县等中心县委和安福、永新、莲花等县委。谭余保任特委书记。1941年底，国民党中统特务破坏了湘赣特委及其下属组织。

中共赣西南特委

赣西南特委正式成立于1939年5月30日，机关初设泰和县马家洲老屋村，后迁万安县的韶口、百嘉等地。特委工作区域为赣西南和赣江流域的赣县、于都、会昌、兴国、宁都、石城、吉安、吉水、峡江、泰和、遂川、万安、永丰、新干、清江、丰城、临川、崇仁、宜黄、广昌、南丰、南城、乐安等县，下属组织有1个中心县委和9个县级党委。刘符节任特委书记。1941年下半年，赣西南特委及其下属组织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破坏。

三、省委主要工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江西省委及其下属组织从多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组织、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和抗日武装等工作上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一）党的组织工作

自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后，党的各级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37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原湘鄂赣、湘赣两省委改为特委。翌年初，南昌、景德镇等地相继重建了党的领导机关。与此同时，党在

各地的组织也自上而下地普遍得到恢复。这个时期党的组织工作是从3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对脱离了组织的党员进行审查并恢复他们的工作；二是大力发展新党员；三是把散处各地的党员召集串联起来。当时客观环境也较便于工作的开展，党的组织由地下转变为半公开，在新四军各地办事机构名义的掩护下积极开展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日益暴露。特别是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其政策完全转向“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江西国民党当局也在1938年10月后公开掀起反共逆流。这个时期，形势虽然在不断恶化，但直到1939年初，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1939年1月建立了赣西北将委，当月还建立了遂万泰中心县委。在3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还决定建立赣西南特委。

1939年3月，中共江西省委根据当时逐渐逆转的形势，对组织工作提供了从巩固中求发展的原则。1939年初，江西各地新四军办事机构被当局强令撤销。6月间，湘鄂赣边发生平江惨案，吉安、赣县、遂川、南城我党主办的生活书店也被反动派查封，党的活动更为困难。这个时期，党的组织工作转为以巩固为中心，放松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整顿组织的措施，清洗不良分子，把组织全部转入地下。

1940年4月前后，国民党制造了“吉赣泰事件”，在吉安、赣州、泰和等地大肆搜捕残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党的基层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组织工作转入收缩隐蔽时期。到1940年底，省委和下属的湘赣特委、赣西北特委、赣西南特委都被迫转移到山区隐蔽工作，湘鄂赣特委则因为环境非常恶劣，组织屡遭破坏，被江西省委撤销。

中共江西省委在1941年7月间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严重破坏。由于叛徒出卖，省委书记和多名省委委员相继被捕。同年底，国民党特务在叛徒引领下攻入省委设在安福县深山中的驻地，省委机关遭彻底破坏。在此前后，赣西南、赣西北、湘赣等特委也受到国民

党特务的严重破坏，下属组织大部瓦解。

（二）党的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是江西党组织的一项主要工作，各级组织都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社会团体统战工作。

1939年日军逼进江西时，党组织曾公开联络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负责人、国民党元老及各界有名望的人物，一方面希望各阶级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能在敌人的严重威胁下进一步团结起来，进行合作抗日，另一方面提出保卫江西的具体意见书。这个举措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共产党抗日的诚意，甚至使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在会中和会后都公开宣称，国民党及政府应该与共产党合作，进行保卫江西的工作。经过上层接洽与谈判后，党组织还在国民党的下级政权机构和国民党基层社会团本中开展工作，把原在当地政府指挥下的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江西青年服务团、江西省抗敌后援会、青年战时工作团等组织改造为国共合作的抗日组织，并在一些基层政权中开展“白皮红心”工作。

（三）党的民众工作

自新四军军部迁南昌和中共江西省委恢复工作后，各级党组织在积极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抗战方针，坚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争取和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各方面人士，领导广大江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众多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在党组织的领导或直接影响下，江西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先后组建了江西省乡村抗战宣传工作团、赣江木船业工人救国会、七七读书会、抗敌后援会青年界分会、妇女界分会、宣传慰劳工作团、江西青年服务团等数以百计的抗日救亡团体。这些团体活跃于全省城乡，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

（四）党的抗日武装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江西党组织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在沦陷区对日伪开展游击战争。江西的湖口、彭泽、九江以及湘鄂赣边界地区被日寇

侵占后，江西党组织在这些地区积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在湘鄂赣边区，江西党组织发起和实际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达到3000多人。这些游击队通过各种统战关系争取到了合法地位，公开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打击当地的敌伪政权，摧毁维持会，捕杀汉奸，并直接与日伪军作战，取得了不少战果，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帮助。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瑞（昌）武（宁）修（水）一线的3个基干连和2000多民众武装、崇阳游击队、通城游击队、咸宁游击队、大冶游击队、武昌游击队、岳阳游击队和湘阴游击队。在南浔线上，活跃着中共九江工委领导的赣北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多次与日伪军进行正面作战，取得了突出的战绩。长江沿线的彭泽、湖口、瑞昌有多支抗日武装，在党组织和新四军的领导下，与日伪军展开生死搏斗，战果显赫。

在抗日战争时期，地处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江西党组织走过了一段充满艰险的曲折道路。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残酷迫害，自1942年以后，中共江西省委系统的党组织被迫基本上停止了活动，但江西境内仍有新四军和中共福建、安徽、湖北党组织领导的地下组织在坚持斗争。这些组织主要活动于赣北、赣东北和长江沿线，其中不少组织一直战斗到全国解放。

文献资料

江西省委政治报告

一九四〇年*

一、自然环境

1. 地理。甲. 自然形势。江西省委今天所管辖的区域,包括以下几个区域、地区:A. 鄱湖及抚河以西、赣(县)南(城)以北的江西部分;B. 湘东及湘东北部分;C. 长江以南的鄂东南全部。这一区域的地理特点是:

(一)大片的但为其他自然条件(河流等)所割裂的山地,其中包括着从湘东北经赣鄂边至九江的幕阜山脉,它横走于湘鄂赣三省的边境,不仅自身相当高峻(五千尺以上),且使三省接近他的地区都成为相当复杂的丘陵地,北至长江西至洞庭湖,东至波湖,南至赣江,都是如此,在它南面,与它连接的有赣北的罗霄山,其次在湘赣边有武功山、荆(井)冈山等,主要部分在赣西,湘东是一丘陵地,再其次就是闽赣边的武夷山脉,它伸展到整个赣河东岸的地区,使赣西南区成为一片高峻的而且复杂的山地,所有这些山地都曾经是过去国内战争时期有名的游击根据地,如中央苏区(武夷山)、湘赣苏区(武功山井冈山)、湘鄂赣苏区(幕阜及罗霄山)。

(二)其次就是水的分布,主要的有由赣西南东北流入鄱湖的赣江,它包括有宁都、兴国、永新、宜春、临川等支流,它的本支流散布在这一区域的大部分地区,次要的有赣北的修河,经修水武宁入鄱湖,湖南的湘江等,此外在这一区域的,于西有洞庭湖,于东有鄱湖,北面鄂东南有几个较小湖泊及长江等,这些水道不仅相当阻碍这一区域

* 原件无成文时间,此时间是编者考证后认定的。

与其周围各区域的交通联络(指不能利用交通工具)且将自身割裂成几个较小的区域,如赣西南、湘赣边、湘鄂赣等。

(三)这一区域虽有大片山地,但有不少平坦的耕种地,散布在各河流的两侧及湖泊的周围,且正因其为河流的冲积地,因此不仅面积相当广阔,且非常肥沃。

(四)这一区域的交通状况近十年来有着很大的变化与开展。

(1)水道的利用,这虽在抗战后有部分已沦陷敌手,但大部分仍可利用,其中主要的有赣河及其支流,大部分仍然航行民船,且终年可用。赣河主流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可通航小汽艇,战争爆发后,尤其南昌失守后,成为不仅江西而且湖南都依靠它的主要运输线。

2)公路,这一区域的公路是相当的密,散布很宽,形成了一个相当完全的公路网,其中大部分是国内战争时修筑,一部分则为抗战后军事上所需要而修筑者,它主要的有干线:赣湘线两条(吉安至衡阳、赣州—郴州),赣粤线三条(赣州—韶关,赣州—和平,宁都—堡岭),赣闽线两条(宁都—汀州,南城—光泽),吉宁(吉安—兴国—宁都)吉赣线(吉安—赣州)赣鹰线(赣州至鹰潭)。此外各县有县道及少数乡道,赣北湘东北及鄂东南的公路均已破坏,不能通车,在这些公路上有汽车、木头车、人力车、兽车等行驶。

乙. 行政区域及保甲状况:A 行政区域:这一区域包括着三个部分,即:

一)鄱阳湖及抚河以西闽赣边到赣县以北的江西部分,共四十七个县

二)湘东及湘东北八个县。

三)长江以南湖北的十个县。

共六十五个行政县,这一区域中有一个最高的行政机关,即江西省政府(在赣西南),江西部分占有七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即以武宁为中心,包括修水、铜鼓等县的第一公署,以萍乡为中心的包括宜春、分宜、万载、新余、清江、上高、高安等县的第二公署,以吉安为中心,包括永新、安福、莲花、宁冈、遂川、万安、泰和、吉水、峡江、永丰等县

为第三公署，第四个公署的十县以南城为中心，包括南丰、新昌、崇仁、乐安、宜黄等县的第七公署以宁都为中心，包括于都、兴国、石城等城的第八公署，以丰兴（疑为奉新）为中心包括靖安、安义、九江、瑞昌、德安、星子等县的第九游击公署，以新建为中心，包括南昌、丰城、临川等县的第十游击公署。湖南部分有两个专员公署，即以浏阳为中心，包括湘阴、平江、临湘等县第一公署，及湘东北的醴陵、茶陵、攸县，湖北部分有一个专员公署即以咸宁为中心，包括长江以南的十个县的第一公署。

B. 保甲状况。保甲制度是国民党在国内战争时期用以统制群众的行政组织，它首先实行于这一区域，但在国内战争时，它虽严格其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定的限度，这原因就在于它虽为一个行政组织而缺乏下层的群众组织来充实他，是很难控制所有人民于这一组织之内，但在抗战后尤其是一九三九年“反共”高潮后，国民党在这一方面有了一些新的设施，这种新的设施，一方面是由于更方便于推行兵役，及其他有关军事的公役，但另一方面亦是由于更方便于“防止异党”活动，它的动机和作用是两面的，一九三九年后有些什么新的设施呢？主要的有：

一) 加强军事性的组织，以保甲作为地方群众武装的基础，这在内战时就已实行，但在内战时主要的仅包括青年男性壮丁，今天则一方面在青年壮丁的组织上更为加强，这表现在训练演习增多，另方面则将非青年壮丁的群众都组织起来，如妇女队（包括全体中年青年妇女）、苍老会（包括五十岁以上的男女）、担架队（包括中年男子）、儿童团（包括十八岁以下的儿童），这样就使群众中没有组织的分子，用这样的办法来组织群众以后，一方面，施以军事训练（壮丁队、妇女队、儿童团），一方面则加强其所谓“国民精神动员”和教育，这是不论男女老少都有的，它的内容是以反共为主甚至是唯一的。

二) 过去保甲制度因为人员经费缺乏和上下级关系不强，其作用受到限制。因此，今天一方面增加了以下的经费，一方面则增加了工作人员，乡级（联保）增加两个干事（民教），几个队附（实际就是军事

干事),保级则有队附二人(壮丁、妇女)等,上下级的关系更加强了,首先是加强乡级保级的权力(降低了区级),其次办公费的增加,使得保级都能脱离生产,增加其上下层关系。

(三)保甲干部特别是乡级以上干部,进行大规模的训练,为此特开办了一个政治讲习院,调训旧的和招训新的,保级的干部则由各县去受训练。这种训练,一方面自然在求其行政能力加强,另方面则是所谓“思想训练”。

(四)就是所谓实行“民主”举行“保民大会”、“乡代表大会”等,以群众来欺骗群众,在“联环保结”与军事监督之下,所谓“民主”当然只能等于欺骗,此外,自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在保甲内建立特务网,特别是在我活动较多的区域,更是加紧这一工作。

这种保甲的新设施,正如上述他的目的,显然的在加强对我们的活动的防止力,国民党企以此来代替真正的群众组织,以半行政的组织来代替群众的组织,使“异党”在群众组织问题上无可藉口和难于进行活动,这就是这些新设施的真实动机,在国民党政府的许多“密令”中是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的,但是在实际情形中国民党和政府达到了这个目的没有呢?对于我们给了一些怎样的影响呢?回答并不是像国民党和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虽然给了我们相当的影响,增加了我们活动中一些困难,然而只要我们能定出适当的群众工作的方针,改变我们群众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抓紧和利用他的组织,是可能的甚至更方便些,因为它是合法的和公开的原因。为什么国民党今天对保甲“改革”不能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的呢?这主要的是:

(一)保甲的本身是一个压迫和榨取群众和群众利益的工具,不仅在内战中群众有很好的经验,抗战后由于兵役问题,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贪污腐化等,群众实在是有极其深刻的经验,因此它在群众中就很难获得信仰,群众今天是不敢反对这一压迫的行政制度,而不是不愿意反对它。

(二)这一工具一般的都是掌握在豪绅地主和地方上一些坏分子手里,当然国民党需要如此,为不得不如此,然而因此就使得它自身